



# 中国当代小说的生态批判

An Eco-criticism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Fictions

黄轶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中国当代小说的生态批判

An Eco-criticism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Fictions

黄轶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当代小说的生态批判/黄轶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1  
ISBN 978-7-301-23613-0

I. ①中… II. ①黄… III. ①小说研究-中国-当代 IV. ①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08849号

书 名 中国当代小说的生态批判

著作责任者: 黄 轶 著

责任编辑: 魏冬峰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3613-0/I·2694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weidf02@sina.com](mailto:weidf02@sina.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926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30毫米×1020毫米 16开本 14.25印张 245千字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6.00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mailto:fd@pup.pku.edu.cn)

#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 序

丁 帆

黄轶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是做清末民初那一阶段的文化—文学转型研究的,尤其是对转型期的代表性作家苏曼殊有所专攻。2007年春,她进入南京大学新文学研究中心做博士后,便开始学术转向,更注重涉猎当代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其学术领域迅速扩大,并成长为年轻一代学者中脱颖而出的一位。期间她承担了几项国家级或省部级课题研究工作,发表了二三十篇专业论文,有的研究成果如《文化守成与大地复魅》《论世纪之交乡土小说的“城市化”批判》等受到学界的关注和好评。一开始我曾怀疑她是否有能力去完成如此繁重的任务,但是,她挺下来了,这全靠着她对学术的执着和顽强的拼搏精神。

关于生态文学理论和批评的研究也是黄轶进站以后才开辟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即便对于学界来说,这也是一个新的学术领域,而且涉足这一领域的多为文艺学专业的学者,多偏重于纯理论研究。我十分赞同她与其他研究者不同的切入点——将其放在上世纪后期到新世纪以来新的文化转型和“新启蒙”的语境中来进行考察,其学术价值就远远大于一般性的基础理论研究和文本批评,其文学启示意义和现实批判意义也就大不一样了。在我看来,把学问做活才是一个理论者的最高境界。

我特别赞成黄轶所说的:在谈生态主义运动时,我们必须谈到知识分子的阶层分化,因为知识分子与现代性陷入了共同的危机。在大众运动、消费主义的时尚热潮经久不息的近些年,大学内外新一代的知识分子正作为现代性歧义的一部分而发展壮大,他们追求文化自主性、多样性,对于“技术专家治国论”统治的价值观产生强烈的反叛意志,他们最先参悟了技术本身的极权主义和破坏性,也反击了政治伦理在与技术专家阶层所代表的商业伦理合谋的过程中所体现的国家主义霸权,这是一支带有知识分子根性的“质疑”精神,虽然力量和效用并不强悍。这一点和生态主义的“反同一”和“反霸权”不谋而合。换言之,在大众文化刺激下成长起来的现代性的反叛精神,孕育了生态主义运动的中坚力量。

知识分子的工作一般必然通过意识形态霸权体系和其不同的调节形式的过滤——例如宗教、文化、教育等,反对意识形态霸权就成为知识分子精英主体意识的体现。当现代性的工具化价值观和世俗化价值观成为思想钳制的巨大力量时,它的对立面必然出现,这就是被不少学者称为“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形态,潜在的一个公共领域正在寻求突破和扩大,从“生态平衡”出发为自然界包括全人类的每一个“个体”争取“更好的”的生存权力和更为和谐的生存空间正是这种公共领域的声音,他们揭示了一个相当有争议的问题,那就是工业化和科学主义并没有最终提供关乎人类价值的最重要的东西,而且在进步中出现了“回报递减率”,它所许诺的“幸福”和“满足”并没有如期而至,这是一种现代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批判性话语,或者在现代性发萌的时候即裂变出这一挑战,生态主义运动正是其行动后果之一。所以,“在全球化的反现代化思潮下,生态运动或许被命名为‘反启蒙’更容易被接受,这是一种历时性的命名方法,把‘现代化反思’作为‘现代’的终结与‘后现代’的开始”。

但是,黄轶认为,认识到这一点还远远不够,在生态批评中,不能将生态批判与现代文明批判混为一谈,二者并非重合,具体在生态小说研究上,前者外延更加广泛,而后者对生态危机的渗透或许表现得更为深刻——尤其对于中国生态现状和生态书写而言,生态批评绝不仅仅是一场随波逐流的“现代性反思”,或者说是一套紧跟西方理论的“反现代性”话语体系。于是,她将生态批判视为这一次世纪转型之交“新启蒙运动”的核心部分之一。在全书的“绪论”部分,她从三个方面论述了生态文化的“新启蒙”意涵:第一个逻辑层面是从发生学的角度,也就是从学理方面来阐释其原理,现代性论题本身是一个“歧义丛生、充满矛盾和对立的存在”,在逻辑的层面上现代性和“反现代性”常常是两位一体的,反思和批判启蒙运动,可以看作是“启蒙时代”的结束,也可以看作是“启蒙”对自身的一种矫正和延续,或者被表述为历史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对应性话语,这是一种共时性的命名方法;第二个逻辑层面是更加侧重于生态启蒙的“未来式”意义,18世纪源起于欧洲的启蒙运动被认为是将人从神权的桎梏中解放出来,那么生态运动则是“为了让陷入现代性迷狂的人类全面和深广地认识到生态危机的严重性和毁灭性”,以期将“自然”从传统强式人类中心主义的钳制下解放出来,这同样应该被视为一场启蒙运动,即“生态启蒙”,而且似乎更为艰巨;第三个逻辑层面是从中国目前前现代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并存的发展阶段出发阐释其存在的意义,她认为:“在这样一个‘启蒙’被涂抹得面目全非的国度,我觉得尤其应该强调对生态思潮的‘新启

蒙’价值的认识,即对其批判性思想锋芒的重塑。”正是由于这些思考,她才尝试从知识者的阶层分化、从知识分子的“批判性”来看取生态主义思潮的“新启蒙”定位。

《中国当代小说的生态批判》的另一独到之处是时时注重从探索“中国式生态危机的生成动因”来展开论述。在西方,从1962年蕾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发表至今,文化思想领域针对科技、欲望、消费主义等现代工业文明的一系列价值理念提出了广泛质疑。随之,作为一种新的文本类型,“生态文学”对生态危机的发生也展开了深刻的追问,这说明通过文学的形式来探索人类的思想、文化和社会发展模式如何影响甚至决定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这些态度和行为又进一步怎样影响甚至导致环境的恶化和生态危机的生成,已经成为知识界重新省察人类文化的发展历程、进行文化批判的重要途径。目前,海外生态主义学说层出不穷,翻译到中国来的著作也如汗牛充栋,如美国学者理查德·瑞吉斯特的《生态城市:重建与自然平衡的城市》、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的《环境伦理学:自然界的价值——对自然界的义务》、欧内斯特·卡伦巴赫的《生态乌托邦》、日本学者岩佐茂的《环境的思想与伦理》、岸根卓郎的《环境论——人类最终的选择》等等。可以说,从上世纪末开始,生态批评似乎已成为世界范围内思想文化界一场对于“我们究竟从哪里开始走错了路”的集体反省。不过,黄轶没有过于倚重理论界对西方生态理论和批评话语的追随,而是出于对中国现代性问题的思考、对“中国式”生态危机的认识欲望以及对当代中国小说生态批判主题的翔实考查,站在对“中国问题”发言的立场上,审慎地提出了怎么认识中国生态危机的“生成机制”问题。

这就是说,一个方面,她与不少作家、批评家一样,对盲目追随西方的“发展模式”进行了批评,提出要建立新的发展理念、重塑新的发展模式,人类必须重新体认荒野的价值,找回对自然的虔敬、对大地的关怀。另一方面,她尝试探讨最不利于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某些“个体”因素。关于后者,她认为进入近现代社会以来,中国最为严重的环境破坏阶段一是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一个新生的国家面临着打破政治压力、突出经济重围的困境,以一些不切实际的“无序发展”来提振民心在所难免,但无论是“大跃进”大炼钢铁还是大批军团的边地屯垦,抑或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宏伟壮举,违背自然规律造成的破坏性是巨大的,它所留下的“后遗症”在慢慢发作,这一点在具有生态意识的知青和边地小说家那里被无情揭示。另一阶段是8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90年代末以来的经济大发展阶段,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深化,不符合“可持续发展”观的掠夺性的经济开发模式

造成的环境危机日益严重,比比皆是生态事件再也没有办法完全归罪于“历史”,体制的弊端、技术官僚体系导致的科技至上、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危机转移、消费主义甚嚣尘上及欲望的膨胀等都是重要原因。

这些认识并非先入为主,而是来自于她收集、阅读二百多篇/部乡土生态小说以及多部田野调查和报告文学。在大量文本分析的基础上,她从生态理想与城市化批判、单一化生存批判与文化多元论、可持续发展与科技至上论和欲望化批判、生态伦理的基点与人类中心主义批判等四个向度对中国当代小说生态批判主题进行了系统研究,提出了这样的论断:中国生态危机的生成,除了现代化、城市化发展和人口剧增的客观因素外,其根源“或许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几十年革命意识形态控制下缺乏民主的政治集权体制和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不无关系,改革开放后技术官僚体制和官僚作风依然是重要因素。

对当代小说的生态批判主题进行研究,必然要涉及的一个重要论题就是怎么看待人类中心主义的问题,这一论题又和伦理学的生态转向密切相关。我们都知道,1935年,美国哲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写下了一部日后影响广远的自然随笔和哲学论文集《沙乡年鉴》,创立了一种生态整体利益的环境伦理思想——大地伦理或曰土地伦理。美国著名的生态整体主义伦理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认为生态系统每一个生物构成者都有其“内在价值”。1970年代,随着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加剧,生态环境运动蓬勃发展,又出现了从生态中心主义出发的深层生态学。深层生态学的创始人之一纳什(R. F. Nash)认为,伦理学应该从只关心人(或他的上帝)扩展到关心动物、植物、岩石,甚至一般意义上的大自然或环境。作为一场理想主义的运动,深层生态学的意旨更加符合发达工业国家人们的内心需求,不一定适用于目前中国的状况,但其蕴涵的道德进步意义令人深思。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如何面对动物的价值无疑是不得不面对的难题,西方的动物解放理论甚或动物中心主义学说的出现将伦理学的转型推向极致。随着人类社会向自然领域的扩张越来越深广,人与自然界动物的冲突日益严峻,许多动物面临着灭绝的境地,而这进一步加剧了整体生态系统的溃败,最终人类对动物的无情又反过来报复在人类自己身上。

关涉“动物价值”的一个核心性的理论观点,就是如何看待人类中心主义的问题。在生态主义者看来,工业革命使得科技成为新的宗教,人从自然中脱颖而出,丧失了对自然的敬畏之心,把自然看作社会发展必须征服和掠夺的对象,不再视自己为大地之子,不再体恤和善待自然万物,这种观念抹杀了自然环境自身的进化规律,也忽略了自然对于人类精神的价



值,这是现代文明的深层弊端。德国学者 F. 厄尔克指认“人是地道的恶魔般的东西”,罗尔斯顿更是极端地说人类只是庞大的地球上生命整体中的一个毒瘤。由此,生态主义者对人类中心主义提出了强烈质疑和批判。受此理论影响,世界范围内以叙写动物来进行生态批判的小说层出不穷,在中国也出现了一拨“动物书写”的热潮,从 80 年代的《野狼出没的山谷》到新世纪的《狼图腾》,其势汹汹,此类文本的生态意涵也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和开掘。老实说,生态主义是一种舶来的后现代思想,后现代思想为生态学运动所倡导的持久的见识提供了科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根据,其中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我们必须更加警惕人类中心主义批判理论走向极端所具有的反人类、反文明、反文化和反历史的本质。

就以《狼图腾》为例。这本小说风靡全球的时候,我曾经从“人性与自然悖论”的角度写过一篇文章,论及新的文化转型期此类小说所体现的文化伦理的蜕变。我认为“这种伦理的‘突变’,暗含着的却是一种历史的倒退,其本质上就是倒退到‘弱肉强食’的原始文化伦理基点上”,我完全不否认西方生态主义运动的价值和意义,也充分肯定真正的生态文学重建文明的理想主义精神,但文学创作如何处理“生态人”的“内自然”与“外自然”的平衡,是一个不能脱离具体文化语境、也无法忽略个人生命体验的“人”的问题。在《狼为图腾,人何以堪?》一文中,我再次强调过自己的人文主义价值观。发展的目的理应是使人更安全、更健康、更舒适地生存,而不是更加不安全。即便我们愿意拿狼来“驯化”人,那种原始生态也是不可复制的,每个历史发展阶段都有各自内在的逻辑。值得肯定的是,黄轶没有从单向度的人类中心主义批判出发来进行人与自然关系的再建构,而是提出了以“弱式人类中心主义”对“强式人类中心主义”进行修正和批判的观点。她认为,肯定人与自然万物的平等,提倡观照地球共同体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命运,反对主体(人类)与客体(自然)的分离,这种生态整体主义思想无可厚非,人类需要对伟大的自然力充满尊重,但在实践中不能导向厌恶人类的思路,而且这种导致悲观、颓废、消极的厌世主义的思路应被视为人类精神的危险滑坡。“当道德主题与自然主题相遇的时候,人类不应该在生态保护中被简单粗暴地看做一种污染物质,如果他对自然犯下了罪恶,并非因为他具有无法改变的原罪中的恶的遗传因素,‘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是更加可能的原因’”,所以,只有重建人的责任意识,凸显“人”作为人与自然协调共处的主体价值,使之重新担当起重建和谐的新生态。

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黄轶的学术道路是从近现代文学研究起步

的,其相对扎实的知识基础使其思考当代的一些问题时也会多一些纵深意识,这是她的一种优势。在谈到生态批评的现状与偏误时,黄轶注意到了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对于可持续发展内涵的理解并不一致,横亘在中国人面前的是另一种比西方更为复杂的现实景观,我们的生态批评不能忽略了中国当下文化土壤和西方后现代意义上的生态批评之间的本质不同。“‘生态问题’在中国当前远远不仅是一个‘后现代’的话题,它面对的伦理嬗变远远不只是‘现代’转向‘后现代’时期生态伦理学的扩张及其自身内在的悖谬,还有大面积的‘前现代’区域在走向现代化过程所必然遭逢的文化冲突、异变以及断裂。”我们的生态批评既不能过分认同西方现代性文化,忽略了“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可以过于追随后现代主义思潮,忽略了我们与西方发展的不同步。西方生态伦理学说的“利己主义”本质是西方意识形态话语浸淫的结果,它是以西方、以富国为利益中心的,生态批评关涉到生态正义,而生态正义要考虑到世界各国目前发展的状况,追求均衡发展,尊重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区域人们的物质欲望和发展权利,中国生态批评在对“唯发展论”和“科学主义至上论”等西方发展模式的批评中,不应该忽略不利于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个体因素。这里边其实关涉到一个她所论述的“生态正义”的问题,生态正义既有代际正义,即我们所说的“我们能给子孙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地球”;还有富国与穷国、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平衡问题,也即一个生态权利问题。

黄轶正是沿袭着这样的一种价值观来解剖中国当代小说生态批判的各种现象,获得了属于自己理论体系的创新论断,值得学界充分重视。当然,“在初创的生态主义理论话语内部,存在着自我伦理的悖论”,而中国当代小说的生态主题意向在文本内也有时相互融汇,有时又对立冲突;有的体现出创作者艺术思考的广深,有时又暴露出其偏执的一面。《中国当代小说的生态批判》也有一些未曾厘清的问题,或者说有些难以化解的节结。就拿“生态文学”的概念和内涵而言,也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再如,怎么辩证认识文化单一性和同质化与原生态文化、“文化多样性”的矛盾。包括在该书中黄轶稍有所及的“生态民主”话题,我们也知道,这个问题极其复杂,在某些区域与“本土化运动”息息相关。总之,生态文学研究正成为当前学界关注的新话题,还有许多的工作值得去做。

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研究成果,黄轶的《中国当代小说的生态批判》是一部时有新见、研论扎实的学术专著,也体现了著者专业知识、学理思辨和性情才气的融通。这几年,我亲见黄轶对学术那种信仰般的热切追

求,她的勤学和敏思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也时常提醒她放慢速度,但她总也慢不下来。梁启超在给梁思成的家书中曾经说做学问要“优游涵泳”,他说:“凡做学问总要‘猛火熬’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去。在慢火炖的时候才能令所熬的起消化作用融洽而实有诸己。思成,你已经熬过三年了,这一年正该用炖的工夫。不独于你身子有益,即为你的学业计,亦非如此不能得益。”因此,我期望黄轶在学术的道路上由踔厉骏发渐趋冲淡从容——步子慢下来,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2013年12月12日于仙林大学城

# 目 录

|                                |         |
|--------------------------------|---------|
| 序 .....                        | 丁帆( 1 ) |
| 绪论 生态批判:作为新启蒙运动的核心部分之一 .....   | ( 1 )   |
| 一、生态批判:“反启蒙”与“新启蒙”的思辨 .....    | ( 1 )   |
| 二、生态危机下的伦理转向与“生态”书写 .....      | ( 8 )   |
| 三、“生态文学”与“乡土生态小说”的意涵界定 .....   | ( 17 )  |
| 第一章 中国当代小说“生态”视阈的开创 .....      | ( 23 )  |
| 一、革命话语下自然意识的“不自觉”呈现 .....      | ( 23 )  |
| 二、生态意识的萌芽与乡土生态叙事的初兴 .....      | ( 29 )  |
| 三、生态视阈的开创及其内在原因 .....          | ( 37 )  |
| 四、生态视阈开启的意义及生态批判的多重主题 .....    | ( 42 )  |
| 第二章 大地返魅的生态保育理想与“城市化”批判 .....  | ( 53 )  |
| 一、以自省精神和超越眼光探寻自然与人性的和谐 .....   | ( 54 )  |
| 二、“朝向大地”的生态情怀与城市化批判的多重向度 ..... | ( 62 )  |
| 三、“城市化”批判的德性坚守及其二元偏见 .....     | ( 71 )  |
| 第三章 单一化、同质化批判与文化多元论 .....      | ( 81 )  |
| 一、原初大地多样化生存生态的消逝与追忆 .....      | ( 81 )  |
| 二、自然“神性”的复魅与文化多样性关切 .....      | ( 92 )  |
| 三、历史回溯中的文化单一性、同质化批判 .....      | ( 101 ) |
| 第四章 “科技至上”论与“欲望主义”批判 .....     | ( 109 ) |
| 一、科技的两面性与科学主义批判 .....          | ( 109 ) |
| 二、“多少算够”:欲望主义批判 .....          | ( 120 ) |
| 三、“零发展”“不发展”与生存悖论 .....        | ( 128 ) |

|                                  |              |
|----------------------------------|--------------|
| 四、“发展”与“可持续”的辩证 .....            | (135)        |
| <b>第五章 “动物书写”与人类中心主义批判 .....</b> | <b>(144)</b> |
| 一、“动物书写”与生态批判 .....              | (145)        |
| 二、“动物书写”的主要类型及生态批判内涵(上) .....    | (153)        |
| 三、“动物书写”的主要类型及其生态批判内涵(下) .....   | (164)        |
| 四、文化伦理的蜕变及“弱式人类中心主义”的建构 .....    | (173)        |
| <b>第六章 生态批评的偏误与批判精神审思 .....</b>  | <b>(185)</b> |
| 一、生态批评的现状及其趋势 .....              | (185)        |
| 二、传统“天人合一”思想资源的援引与历史经典重读 .....   | (190)        |
| 三、西方批评话语的借鉴与“中国经验”阐释的有限性 .....   | (195)        |
| 四、生态文学的历史反思、现实批判与生态民主 .....      | (199)        |
| <b>参考文献 .....</b>                | <b>(210)</b> |
| <b>后记 · 自然的恩宠 .....</b>          | <b>(216)</b> |

## 绪论 生态批判:作为新启蒙运动的核心部分之一

在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看来,现代社会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之间存在着惊人的分裂。受经济原则支配的社会结构通过给物(包括人)制定秩序来确定如何生产,包括自律、享受与约束的分界,而当今文化则抛弃了这种资本主义价值观,它是“挥霍无度、不加选择的,受非理性、反智性风气所主导”的。这一对立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本身运作的结果,也正是所谓的内在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sup>①</sup>。以上丹尼尔·贝尔的表述,直指了现代性内含的悖论以及其造成的繁荣富庶的物质奇观与欲望膨胀、自然控制之间密切又对立的关系。生态主义思潮正是在这样一种对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和文化结构的深层矛盾深刻认知的基础上兴起的,这也是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逻辑性结果,而其更为直接的原因也出自这种矛盾的直接“后果”——全球化的自然破坏和生态危机。乐观地讲,当下的生态主义思潮,也正成为“新启蒙”运动的核心部分之一,其间所体现的思想嬗变会成为影响人类“新文化”生成的巨大推动力;但从另一面讲,它也有可能走向偏激的歧路。

### 一、生态批判:“反启蒙”与“新启蒙”的思辨

从世界范围来看,人类目前的生存危机除了战争威胁,可能最广泛而迫切的就是人与自然的问题,而甚而战争的威胁本身有时也是人与自然矛盾的一部分。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正成为“新启蒙”运动的重要核心部分之一,它立意建构一种新的理论范式,即生态主义——在这个全球化时代来临时,从人类意识的根本理想与良知出发,反思人类对自然造成的不可逆转的破坏,停止各利益团体之间无谓的纷争,建立全球性的“统一生

---

<sup>①</sup> [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严蓓雯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0页。

态系统”，这在广义上被称为“第二轮启蒙运动”<sup>①</sup>。德国学者乌尔希里·贝克也曾屡次提出必须对现代性进行反思，提倡第二次现代化，呼唤生态启蒙，他认为生态启蒙是“启蒙的启蒙，它将自己的利刃磨得更为锋利，对第一次启蒙的苛求与普遍主义进行鞭挞，并在这种意义上成为第二次启蒙”<sup>②</sup>。相对于18世纪的启蒙运动，生态主义运动是关乎全人类的、更为开放也应该更为彻底的全球性运动，也是21世纪人类进程无法回避的问题。在国内，北京大学2009年8月召开的“生态文学与环境教育国际研讨会”上，学者们也响应了把生态主义思潮和运动作为“新启蒙运动”之一部分的口号。

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生态主义被视为对启蒙主义的批判，那么，“反启蒙”与“新启蒙”认定之间的吊诡是值得深入探讨、辩证思考的议题。

技术、知识和权力的媾和“在全球范围内扩大了经济控制和政治控制，重新影响了我们的整个文化（包括我们的知识分子生活）。在启蒙主义价值观的引导下，技术必要性提供了一种人类进步观，这种进步观与不断增进的自然控制和似乎无限的物质商品的生产有联系”<sup>③</sup>。18世纪起源于欧洲的启蒙运动曾有过自己辉煌的历史，到20世纪，人类社会物质文明取得极大发展，科学的突飞猛进带来生存条件的极大改善；但由于启蒙运动过度强调理性与科学技术，最终走向了现代性的反面，并给日后生态破坏“合理化”埋下了祸根。技术、知识和权力的融合，是人类现代性时期的基本特征。所以我们说，20世纪也是一个人类对地球对环境负债累累的世纪，失去敬畏感的人们不再懂得感恩，以万物之灵的名义贪得无厌地攫取财富，对其他生命生杀予夺，造成的生态危机正成为阻碍人类健康前行最关键的问题。或许，这也标志着人类进程裹挟着荣光与罪恶正在向一个新的文明阶段转型，余谋昌在其《生态哲学》一书中将其命名为人类文明依次递进的自然文明阶段、人文文明阶段、科学文明（工业文明）阶段之后的第四阶

① 参阅〔美〕里夫金（Jeremy Rifkin）：《欧洲梦——21世纪人类发展的新梦想》之《全球时代来临之第二次启蒙运动》，杨治宜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

② 乌尔希里·贝克的理论散见于《自反性现代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自由与资本主义》（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风险社会》（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等著作中。这里参阅薛晓源、陈家刚：《从生态启蒙到生态治理——当代西方生态理论对我们的启示》，见薛晓源、李惠斌主编：《生态文明前沿报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0页。

③ 〔美〕卡尔·博格斯：《知识分子与现代性的危机·前言》，李俊、蔡海榕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段,即生态文明阶段。<sup>①</sup> 生态文明是一种正在生成和发展的文明范式。

不必讳言,现代人是工业文明的肇始者,也是工业文明的受害者。英国利物浦大学教授贝特之《大地之歌》对此有过归纳:“公元第三个千年刚刚开始,大自然却早已进入了危机四伏的时代。大难临头前的祈祷都是那么相似。……全球变暖……冰川和永久冻土融化,海平面上升,降雨模式改变……海洋过度捕捞,沙漠迅速扩展,森林覆盖率急剧下降,淡水资源严重匮乏,物种加速灭绝……我们生存于一个无法逃避有毒废弃物、酸雨和各种有害化学物质的世界……城市的空气混合着二氧化氮、二氧化硫、二氧化碳……农业已经离不开化肥和农药……而畜牧业,牲畜的饲料里竟然含有能导致人中枢神经崩溃的疯牛病毒……”<sup>②</sup>据报道,在中国,这一系列问题都有出现,特别是水资源的污染和缺乏、空气污染的严重性、土地的荒漠化程度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而森林覆盖率却远低于世界人均水平,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些问题变得越来越让人忧虑。所以,在全球化的反现代化思潮下,生态运动或许被命名为“反启蒙”更容易被接受,这是一种历时性的命名方法,把“现代化反思”作为“现代”的终结与“后现代”的开始。

但是,将生态批判视为“新启蒙运动”的核心部分之一自有其深刻原因。其一,从发生学的角度讲,现代性永远是一个歧义丛生、充满矛盾和对立的存在,今天,反思和批判启蒙运动,可以看做是“启蒙时代”的结束,也可以看做是“启蒙”对自身的一种矫正和延续,本来现代性和“反现代性”(或被称为“后现代主义”)是两位一体的,在某些地方或者被表述为历史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对应性话语,在逻辑的层面上来分析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和张力,这是一种共时性的命名方法;其二,为了让陷入现代性迷狂的人类全面和深广地认识到生态危机的严重性和毁灭性需要一场新的“启蒙运动”即“生态启蒙”,或者说,18世纪源起于欧洲的启蒙运动是让人从神权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生态运动则是试图将“自然”从传统强式人类中心主义的钳制下解放出来,这同样是一场启蒙运动,而且更为艰巨;其三,在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在这样一个“启蒙”被涂抹得面目全非的国度,我觉得尤其应该强调对生态思潮的“新启蒙”价值的认识,即对其批判性思想锋芒的重塑。在这里,我愿意尝试从知识者的阶层分化、从知识分子的“批

① 余谋昌:《生态哲学》,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2页。“生态文明”(ecological civilization)一词最早由美国著名作家和批评家罗·莫里森(Roy Morrison)1995年在《生态民主》(Ecological Democracy)一书中明确提出。

② 参见王诺:《欧美生态文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31—232页。



判性”来看取生态思潮的“新启蒙”定位。

在谈生态主义运动时,我们必须谈到知识分子的阶层分化,因为知识分子与现代性陷入了共同的危机。我们面临着一个知识分子越来越科层化的时代,美国学者卡尔·博格斯将知识分子分为技术专家治国型、批判性和其他知识分子三个阶层。“技术专家治国型知识分子阶层的扩张是以高度工业化的社会为特征的,是深刻的不断变化的物质力量和文化力量的表现形式”<sup>①</sup>,这些物质力量已经摧毁了传统现代型知识分子的社会基础。同时,在大众运动、消费主义的时尚热潮经久不息的近些年,大学内外新一代的知识分子正作为现代性歧义的一部分而发展壮大,他们追求文化自主性、多样性,对于“技术专家治国论”统治的价值观产生强烈的反叛意志,他们最先参悟了技术本身的极权主义和破坏性,也反击了政治伦理在与技术专家阶层所代表的商业伦理合谋的过程中所体现的国家主义霸权,这是一支带有知识分子根性的“质疑”精神,虽然力量和效用并不强悍。生态主义的“反同一”和“反霸权”正与此不谋而合。换言之,在大众文化刺激下成长起来的现代性的反叛精神,孕育了生态主义运动的中坚力量。在西方,生态主义大致分为三类,即主张生态原始主义的生态中心主义、主张生态社会主义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主张绿色资本主义改良派的欧洲主流绿党思想;或者并不严格地划分为生态社会主义、生态资本主义、生态现实主义、生态激进主义和生态女权主义等。这些反叛者将成为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的“有机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工作一般必然通过意识形态霸权体系和其不同的调节形式的过滤——例如宗教、文化、教育等,反对意识形态霸权就成为知识分子精英意识的体现。当现代性的工具化价值观和世俗价值观成为思想钳制的巨大力量时,它的对立面必然出现,这就是被不少学者称为“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形态,潜在的一个公共领域正在寻求突破和扩大,从“生态平衡”出发为自然界包括全人类的每一个“个体”争取“更好的”生存权利和更为和谐的生存空间正是这种公共领域的声音,他们揭示了一个相当有争议的问题,那就是机械化和科学并没有提供什么关乎人类价值的东西,而且在进步中出现了“回报递减率”,这是一种现代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批判性话语,或者在现代性萌发的时候即裂变了这一挑战,生态主义运动正是其行动后果之一。

这种声音在表达现代性焦虑与反思时所提出的生态理论是对自然的

---

<sup>①</sup> [美]卡尔·博格斯:《知识分子与现代性的危机》,李俊、蔡海榕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97页。